

言浮于行,实以治之:高管环保背景与企业“漂绿”

牛枫,罗智超,邱保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企业“漂绿”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阻碍。基于高阶理论,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高管环保背景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通过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提升企业环境合法性和减少企业环境成本抑制企业“漂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重污染企业和位于内陆城市的企业中,高管环保背景对于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高管环保背景;漂绿;环境信息披露;企业环保意识;环境合法性;环境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5)02-0055-12

一、引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应对环境挑战,我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并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企业作为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的主体,其环境行为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可持续性。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展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和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已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1]。特别地,我国于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企业应按时披露ESG信息,进一步凸显了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然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应对外界监管压力的双重驱动下,部分企业可能会采取“言浮于行”的环境策略,其环保行动与言辞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即“漂绿”^[2]。

“漂绿”源自“漂白”与“绿色”两个词的融合,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环境合法性和自身利益^[3],通过虚假披露或选择性地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4],掩盖其并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表现,但实际上并未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属于实质性行为与象征性行为之间的解耦^[5]。“漂绿”不仅损害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判断和决策,更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如何遏制“漂绿”这种伪社会责任现象,实现“真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文献从多个层面考察了企业“漂绿”的治理机制,例如环境规制^[6]、媒体关注^[7]、机构投资者^[4]以及数字化转型^[8]等因素都能显著影响企业“漂绿”。然而,以上研究往往假定企业高管及其决策行为具有同质性,忽略了高管主观能动性和个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潜在影响。鉴于企业决策的核心仍在于其高层管理者,深入探讨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高阶理论认为,高管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都将影响企业行为^[9]。高管通过教育或工作经历所形成的个人特征,不仅塑造了他们区别于其他高管的决策风格,而且还能影响其认知

[收稿日期]2024-08-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BJY203)

[作者简介]牛枫(1976—),男,山东泗水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邮箱:niufeng@hdu.edu.cn;罗智超(1998—),男,浙江嘉兴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环境治理;邱保印(1982—),男,河南泌阳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

模式。已有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10]、海外背景^[11]、贫困经历^[12]等因素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已有少量文献开始关注高管环保背景这个独特的个人特征,如 Li 等发现高管环保背景通过降低企业环境战略的风险和成本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13]。卢建词和姜广省的研究证实高管的绿色经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14]。但是,鲜有文献将高管环保背景作为企业“漂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高管通过环保教育或工作获得的环保背景可能会强化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提高企业对于可持续问题的关注,从而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最终可能影响企业“漂绿”。因此,探讨高管环保背景能否抑制企业“漂绿”,并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对于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高管环保背景为主要研究视角,考察其对于企业“漂绿”的治理效应。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丰富了对企业“漂绿”治理因素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漂绿”的经济后果,认为其可以削弱企业环境合法性、抑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影响企业“漂绿”因素的研究一般从环境规制、媒体监督等角度出发^[6-7],本文则独辟蹊径,以高管环保背景为主要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其与企业“漂绿”之间的关联,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增添了新的内容。第二,本文拓展了高管个人特质对于企业行为的研究。与以往侧重高管学术经历^[10]、海外背景^[11]等特征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高管环保背景出发,探讨了其与企业“漂绿”的因果关系,并进行了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从而拓展了高阶理论的应用范围和研究深度。第三,为了帮助我国企业理解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更多的本土化研究为其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合规化进程提供了最新的实证证据,也为企业如何招聘和培养高管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企业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目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高阶理论,高管的价值观受个人特征和职能背景的影响^[9]。过去的环保教育背景或环保工作经验不仅有助于高管积累相关专业知

(一) 企业环保意识增强效应

高管环保背景能够提高企业整体的环保意识,从根本上减少“漂绿”。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有环保背景意味着其更可能将环保理念系统性地纳入企业战略规划,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的平衡^[15]。在当前政府、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漂绿”现象频发。然而,具备环保教育背景或有在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高管,通常展现较强的环保意识和道德水平,对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敏锐的洞察力^[16],凭借其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环保实践经验,能够将其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管理经验融入企业文化和日常运营中,在企业内部推行切实有效的环保政策,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17]。一方面,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对绿色发展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刻,其与环保相关的专业学习和工作的特殊经历,往往更能彰显坚韧、创新以及抗压等品质。当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大、风险高的环境治理问题时,环保背景高管能够客观预期和评估可能遇到的困难,较少出现因急功近利或风险规避而导致的短视行为,帮助企业度过绿色转型的“阵痛期”。同时,他们更有意愿从组织的整体利益出发,鼓励管理层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勇于尝试新的策略和方法,坚定不移地履行真实的环境责任^[18]。另一方面,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和决策,发挥榜样示范效应,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将环境保护视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应对外部压力的被动负担。此外,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会更加注重员工绿色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与提升,致力于将这些软实力转化为企业的实际生产力,为企业培育潜在的环保人才,构筑独特的绿色竞争优势^[19]。这种从上至下的环保

倡导,能够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组织,渗透到企业的各个层面,有助于形成全员参与的环保文化氛围,从而减少为了短期经济效益而进行的象征性绿色行为,即“漂绿”。

(二) 环境合法性提升效应

高管环保背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合法性,进而抑制企业“漂绿”。根据合法性理论可知,企业进行“漂绿”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环境合法性以换取公信力,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从而满足利益相关者与日俱增的环保需求。然而,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的环保行为更容易受到公众的严格监督。同时,“漂绿”作为一种短期投机战略行为,一旦被揭露就会带来降低消费者信心、降低购买意愿以及减少商业合作等不利影响^[20]。如果企业高管团队拥有具备环保背景的成员,企业的环境合法性可能会有所改善,并影响企业的“漂绿”行为。一方面,从内部治理角度出发,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往往更加熟悉环境法规和行业规范,并能敏锐地捕捉社会舆论的变化趋势,主动采取先行风险控制措施,引导企业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有效规避因合规性问题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21]。相比之下,缺乏环保经历的管理层可能为追求短期业绩的稳定性而采取“漂绿”策略,导致企业面临环境违规的风险,甚至引发社会公众的反感和抵制,最终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而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凭借其相对高级的知识禀赋,可以提升管理层的多元化程度,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环境政策信息,实现管理层内部的信息互补与融合,避免出现目光短浅的问题,从而提升长期环境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外部视角出发,信号理论指出,高质量主体可以通过发送难以模仿的信号来区分自己。在企业环境责任领域,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可被视为一种可靠的信号,表明企业对环境责任的坚定承诺。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倾向于从事更多实质性的环保工作,通过增加环保投资、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开发绿色产品等多元化策略,减少企业“漂绿”行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22]。正如 Huang 和 Wei 所言^[23],这类高管的存在本身就在向外界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信号,也是企业获取环境合法性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还能够加强与政府部门、民间环保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声誉,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合法性^[24]。随着环境合法性的提高,能够有效避免企业因违规而产生的罚款、停产等风险,并且能够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从源头上减少企业为了掩盖其真实环境治理情况而进行“漂绿”的动机。

(三) 环境成本降低效应

高管环保背景能够降低企业“真实”环境责任履行的成本,减少企业“漂绿”倾向。尽管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具有正外部性,但需要在生产过程、人才培养以及设备更新等投入大量资金,可能对企业的短期利润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试图改善自身环保形象且规避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可能会倾向于采取投资少、收益快和不易被发现的“漂绿”策略,并以此误导消费者和投资者^[25]。然而,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介入企业运营与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首先,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具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擅长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改进污染治理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促进清洁生产和绿色创新^[21]。同时,他们通过精准识别并有效管理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仅能够有效规避因环保违规而产生的高昂罚款风险、降低长期环境成本负担,还能在此基础上优化运营效率,从而更易于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与投资^[26]。其次,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注重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能够从全局出发,预见未来环保法规的趋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提前布局绿色供应链、清洁能源利用等前瞻性项目,从而降低因相关政策变动或竞争变化而带来的环境成本。最后,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方式,提高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透明度,既有助于满足政府部门的最新监管要求,也能够回应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环保关注,从而降低因信任危机而导致的市场风险和额外成本^[13]。此时,拥有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更容易建立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之间长期的合作机制,争取到更多资金支持与税收优惠,以缓解融资约束,实现成本的平滑过渡和长期效益的最大化,进而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高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27]。

当“真实”环保行动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显著降低时,企业自然倾向于脚踏实地地履行环境责任,加快绿色转型进程,而非选择华而不实的“漂绿”策略。成本效益的权衡机制强化了企业进行实质性环保行动的动机。

综上所述,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能够增强整个企业的环保意识,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升企业的环境合法性和降低环境成本,最终减少企业“漂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高管环保背景可以抑制企业“漂绿”。

H2:高管环保背景通过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抑制企业“漂绿”。

H3:高管环保背景通过提升企业环境合法性抑制企业“漂绿”。

H4:高管环保背景通过降低企业环境成本抑制企业“漂绿”。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

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运用 Python、Stata17.0 完成了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处理样本的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2)剔除 ST、*ST、PT 类上市企业;(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10349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企业“漂绿”利用彭博社 ESG 数据和华证 ESG 数据来评估^[6,28],其他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中国知网、Wind 和 CSMAR 数据库。同时,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 水平上的双侧缩尾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漂绿”(GWS)

参考 Yu 等、Zhang、王建新等的研究^[4,6,8,28],企业“漂绿”(GWS)可以通过比较 ESG 披露水平评分和 ESG 真实绩效评分的差距来衡量。其中,彭博 ESG 评分衡量企业 ESG 的披露水平,该机构是目前唯一提供 ESG 披露评分的可信机构,并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使用^[1,4];华证 ESG 评分代表企业 ESG 的真实绩效,其数据范围广、时间跨度长且贴近中国企业实际情况,具有较高权威性^[8,28]。

具体计算方法见以下公式, $D_{i,t}$ 和 $P_{i,t}$ 分别代表企业的 ESG 披露水平和绩效评估得分。 \bar{D} 和 \bar{P} 代表相同行业和年度 ESG 披露水平和 ESG 真实绩效评价得分的平均值。 σ_D 和 σ_P 代表相同行业和年度 ESG 披露水平和 ESG 真实绩效评价得分的标准差。同时,为了使不同行业和两个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可比较,本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GWS 的值越大,代表企业“漂绿”的程度越高。

$$GWS_{i,t} = \frac{D_{i,t} - \bar{D}}{\sigma_D} - \frac{P_{i,t} - \bar{P}}{\sigma_P}$$

2. 解释变量:高管环保背景(Green)

参考王辉等的研究^[15],从企业高管的个人简历数据中查找是否有“环境”“环保”“新能源”“清洁能源”“生态”“低碳”“可持续”“节能”“绿色”等关键词,以判断高管以前是否接受过“环保”相关教育或从事过“环保”相关工作。如果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具有环保相关教育或工作背景,则企业本年度的高管环保背景(Green)取值为 1,否则为 0。

3. 机制变量

(1) 企业环保意识(EA)。参考毛其淋和石步超的研究^[29],利用上市公司年报的管理者分析与讨论部分(MD&A)中环保相关词语的数量加 1 取对数来衡量企业环保意识。

(2) 环境合法性(EL)。参考 Li 等的研究^[30],采用公共媒体评价来衡量企业的环境合法性。采用公共媒体评价来衡量企业环境合法性。具体而言,从中国知网的核心报刊数据库中收集 2011 年至 2022 年关于企业环境保护的相关新闻,并将其分类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类。通过计算 $J-F$ 系数量化得到企业的环境合法性。其中, e 是正面新闻数量, c 是负面新闻数量, $t = e + c$ 。具体如下,EL 的取值范

围为 -1 到 1,越接近 1,表示企业在公众媒体中的环境形象越积极,环境合法性越高。

$$EL = \begin{cases} \frac{e^2 - ec}{t^2}, & \text{如果 } e > c \\ \frac{ec^2 - c}{t^2}, & \text{如果 } e < c \\ 0, & \text{如果 } e = c \end{cases}$$

(3) 环境成本(EC)。参考邹甘娜等的研究^[31],利用企业每年支出或缴纳的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相关的费用衡量企业环境成本,具体包括资源税、资源费、排污费、环境罚款支出、环境保护税等。

4. 控制变量

参考 Liu 等、王辉等的研究^[1,15],设置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用年末总负债和年末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总资产净利率(ROA),用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定义为本年营业收入除以上一年营业收入减 1;董事会规模(Board),定义为企业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比例(Indep),用独立董事占董事人数的比例来衡量;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则为 1,否则为 0;股权集中度(Top1),用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企业成立年限(FirmAge),用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三) 研究模型

为了检验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GWS_{i,t} = \beta_0 + \beta_1 Green_{i,t} + \beta_n Controls_{i,t} + \mu_i + \sig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GWS 代表企业“漂绿”;Green 是指企业是否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Controls 是一组控制变量,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σ_t 为年度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特别地,为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进一步对企业层面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进行聚类。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GWS	10349	-0.056	1.062	-2.255	-0.110	3.104
Green	10349	0.206	0.404	0.000	0.000	1.000
EA	10349	1.956	0.691	0.000	1.946	3.332
EL	10349	0.365	0.351	-1.000	0.347	1.000
EC	10349	14.337	5.135	4.190	15.827	22.053
Size	10349	23.171	1.276	19.585	23.073	26.452
Lev	10349	0.474	0.200	0.032	0.486	0.908
ROA	10349	0.050	0.063	-0.373	0.042	0.247
Growth	10349	0.175	0.411	-0.658	0.110	4.024
Board	10349	2.172	0.200	1.609	2.197	2.708
Indep	10349	0.376	0.056	0.286	0.364	0.600
Dual	10349	0.210	0.407	0.000	0.000	1.000
Top1	10349	0.372	0.161	0.080	0.358	0.758
FirmAge	10349	2.931	0.334	1.386	2.996	3.61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本文 Green 的平均值为 0.206,这表明样本中仅有 20.6% 企业的高管具有环保背景,我国上市企业中环保背景的高管比例相对较小。本文 GWS 最小值为 -2.255,最大值为 3.104,标准差为 1.062,高于平均值 -0.056,表明“漂绿”分散性较大,不同企业的“漂绿”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均在合理范围内,不再赘述。

(二) 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模型(1),实证检验高管环保背景与企业“漂绿”之间的关系。表 2 的列(1)显示了单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是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Green 的系数显著为负。列(3)在进一步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后,Green 的回归系数为 -0.120,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 H1,表明企业高管团队具有环保背景时,企业“漂绿”程度显著减弱,这与 Huang 和 Wei 的研究结论类似^[23],即高管环保背景可以改善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并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文的结论也补充了卢建词等、李毅等的研究^[14,21],即高管环保背景可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环境绩效。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方法一:根据黄溶冰等的观点^[3],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衡量“漂绿”程度。根据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应披露的内容,设计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即“治理与机构”“过程与控制”“投入与产出”和“合规与合法”,评估企业披露这些指标的程度,辨别披露是象征性还是实质性的。然后,计算选择性披露 $GWLS = 100 \times (1 - \text{已披露项目数}/\text{应披露事项数})$,表述性操纵 $GWLE = 100 \times (\text{象征性披露数} \div \text{已披露事项数})$,企业“漂绿”程度 $GWL = \sqrt{GWLS \times GWLE}$ 。

方法二:参考 Hu 等的研究^[32],构建绿色或环境相关的词集,分析这些词在 MD&A 中的频率,如果频率大于同期同行业的中位数,则虚拟变量 *Oral* 等于 1,否则为 0。确定企业本年度是否受到环境惩罚,如果受到惩罚,则 *Actual* 等于 1,否则为 0。替代变量 *GW* 计算如下,若 *Oral* 和 *Actual* 同时为 1,则企业存在“漂绿”行为。

$$GW_{i,t} = \begin{cases} 1, & \text{if } Oral_{i,t} = 1 \text{ and } Actual_{i,t} = 1 \\ 0, & \text{o. w.} \end{cases}$$

方法三:参考 Yu 等的研究^[4],利用汤森路透数据库 (Asset4) 的 ESG 绩效评价得分数据,替代原来的华证 ESG 数据,重新计算得到 *GWS_A*。

回归结果如表 3 的列(1)至列(3)所示, *Green*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假设 H1 的结论依旧稳健,高管环保背景的确能够显著减少企业“漂绿”。

2. 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到 CEO 是企业领导者和资源整合者,对企业的日常运营和整体决策有着重大影响^[18],因此,进一步筛选出 CEO 是否具有环保背景 (*Green_CEO*)。同时,由于较多中国企业的董事长是企业的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也筛选出董事长是否具有环保背景 (*Green_Chair*)。此外,本文还构建了环保背景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 (*Green_ratio*) 和环保背景高管的总人数加 1 取对数 (*Green_all*) 作为替代变量。表 4 列(1)至列(4)显示,替代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证明了假设 H1 的结果是稳健的。

3. 剔除“环保类企业”

由于“环保类企业”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可能吸引更多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任职,其高管团队也可能具备更多环保相关的学习经历或工作经验,这会对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产生干扰。为了减少这种潜在偏差,参考王辉等的研究^[15],剔除在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包含“环保”“绿色”“清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GWS	(2) GWS	(3) GWS
<i>Green</i>	-0.208 *** (-8.077)	-0.245 *** (-9.557)	-0.120 *** (-3.283)
<i>Cons</i>	-0.014 (-1.173)	-0.859 *** (-3.351)	4.165 *** (5.024)
<i>Controls</i>	No	Yes	Yes
<i>Firm FE</i>	No	No	Yes
<i>Year FE</i>	No	No	Yes
N	10349	10349	10349
Adj-R ²	0.006	0.030	0.415

注: *、**、***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0%、5%、1%; 括号内为 t 值, 计算时使用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同。

表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GWL	(2) GW	(3) GWS_A
<i>Green</i>	-0.088 ** (-2.000)	-0.020 ** (-2.145)	-0.188 *** (-3.173)
<i>Cons</i>	2.932 (1.624)	-0.583 *** (-2.902)	0.080 (0.04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N	3250	9580	2597
Adj-R ²	0.366	0.226	0.447

表 4 替换解释变量

	(1) GWS	(2) GWS	(3) GWS	(4) GWS
<i>Green_CEO</i>	-0.132 ** (-2.395)			
<i>Green_Chair</i>		-0.142 ** (-2.544)		
<i>Green_ratio</i>			-0.474 *** (-3.211)	
<i>Green_all</i>				-0.091 ** (-2.149)
<i>Cons</i>	3.937 *** (3.703)	3.990 *** (4.816)	3.695 *** (4.451)	4.069 *** (4.91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Yes
N	10349	10349	10349	10349
Adj-R ²	0.415	0.411	0.420	0.415

“新能源”“生态”“低碳”等环保相关词语的企业,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环保类企业”的样本数量较少,且在剔除“环保类企业”样本后,Green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假设 H1 的结论依然稳健。

4. 双重机器学习法

由于传统因果推断方法受严格假设、“维度诅咒”和多重共线性问题限制,可能导致估计偏误。相比之下,双重机器学习利用变量选择和正则化算法,能够获得无偏估计结果。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法重新检验高管环保背景与企业“漂绿”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将研究样本比例分割为 1:4,选择随机森林和神经网络算法,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集合的一次项与二次项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6,Green 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1) 更换回归模型。将 GWS 生成哑变量,并采用面板 Logit 模型回归。(2) 缩短时间窗口。鉴于环境规制也会影响企业的“漂绿”战略^[25],因此,剔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3) 引入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行业和省份因素的影响。(4) 考虑时间滞后效应,本文将 Green 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以上检验的回归结果均与假设 H1 的结论一致。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四) 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为了缓解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参考卢建词等、李毅等的研究^[14,21],上一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拥有环保背景高管的比例会影响企业本年度是否聘任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但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漂绿”,因此,将上一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拥有环保背景高管比例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V),表 7 列(1)和列(2)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两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67.553,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118.441,Hansen J 统计量为 0.000。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IV 与 Green 显著相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

表 5 剔除“环保类企业”

	(1)	(2)
	剔除企业名称中含环保词语的样本 GWS	剔除企业经营范围中含环保词语的样本 GWS
Green	-0.125 *** (-3.400)	-0.142 *** (-3.754)
Cons	4.045 *** (4.853)	4.514 *** (5.240)
Control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N	10157	9532
Adj-R ²	0.415	0.418

表 6 双重机器学习回归结果

	(1)		(2)		(3)		(4)	
	随机森林算法		神经网络算法		随机森林算法		神经网络算法	
	GWS	GWS	GWS	GWS	GWS	GWS	GWS	GWS
Green	-0.161 *** (-4.512)	-0.169 *** (-4.749)	-0.135 *** (-3.650)	-0.141 *** (-4.355)				
Cons	0.027 *** (2.996)	0.029 *** (3.122)	-0.041 *** (-4.460)	0.292 *** (29.348)				
控制变量一次项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二次项	No	Yes	No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10349	10349	10349	10349				

表 7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5)				
	工具变量法					PSM					Heckman					多时点 DID									
	Green	GWS	GWS	GWS	GWS	Green	GWS	GWS	GWS	GWS	Green	GWS	GWS	GWS	GWS	Green	GWS	GWS	GWS	GWS					
Green	-1.391 *** (-2.727)					-0.115 ** (-2.215)					-0.110 ** (-2.505)														
IV	0.911 *** (7.359)																								
IMR																									
Treat × Period																									
Cons	0.031 (0.142)	6.357 *** (3.809)	6.199 *** (4.856)	4.529 *** (4.247)	3.847 *** (4.42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8378	8378	5148	8378	8984																				
Adj-R ²	-	0.357	0.403	0.452	0.397																				

绿”的影响仍然显著负相关,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假设 H1 的结论仍然成立。

2. 倾向得分匹配(PSM)

为了减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采用 PSM 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将高管是否具有环保背景的哑变量(*Green*)作为因变量对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各变量的倾向得分。随后,采取 1:2 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将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样本与不具有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进行匹配。最后,根据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表 7 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Green* 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表明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进一步支持了结论的稳健性。

3. Heckman 两阶段法

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环境表现较好的企业,为了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检验。第一阶段基于前文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构建 Probit 模型,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加入模型(1)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表 7 列(4)的估计结果表明,*IMR* 的回归系数显著,同时,*Green* 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在排除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后,高管环保背景仍然显著减少了企业“漂绿”。

4. 多时点 DID

为了进一步控制内生性问题,参考 Liu 等的研究^[1],本文使用多时点 DID 模型来检验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两类,观察期间从未拥有过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为控制组,曾聘任过环保背景高管的企业,但在不同的年份,设为实验组。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多时点 DID 模型,并剔除了上市年份不足 3 年和观测值不足 5 年的数据:

$$GWS_{i,t} = \beta_0 + \beta_1(Treat_i \times Period_{i,t}) + \beta_n Controls_{i,t} + \mu_i + \sig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系数 β_1 反映了企业聘任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前后,企业“漂绿”程度的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7 的列(5),*Treat* \times *Period*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五、进一步研究

(一)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假设 H2、H3 和 H4 进行了检验。由于传统三步法机制检验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偏误问题,且前文也已充分探讨企业环保意识、环境合法性和环境成本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因此,参考江艇的研究^[33],通过观测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模型如下,其中 *M* 代表机制变量。同时,为了稳健性,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次数为 1000 次)进行检验。

$$M_{i,t} = \beta_0 + \beta_1 Green_{i,t} + \beta_n Controls_{i,t} + \mu_i + \sig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1. 企业环保意识增强机制

企业环保意识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8 Panel A 的列(1)所示,*Green* 对机制变量 *EA*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的环保背景能够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并推动企业在日常运营中更加关注环境保护,不仅体现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还可能渗透到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中,形成一种全员参与的环保氛围。随着企业环保意识的提升,企业整体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相应增加,从而有效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同时,Panel B 的 Bootstrap 抽样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系数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 且显著。因此“高管环保背景→增强企业环保意识→减少企业‘漂绿’”的机制成立,假设 H2 得证。

2. 环境合法性提升机制

环境合法性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8 Panel A 的列(2)所示,*Green* 对机制变量 *EL*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高管的环保背景提升了企业的环境合法性。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企业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增加象征性的绿色行为。然

而,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通常具备丰富的环保实践经验,从而能够推动企业实施更加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策略,最终提升企业环境合法性。随着环境合法性的提升,企业的“漂绿”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此外,Panel B 的 Bootstrap 抽样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系数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 且显著。因此,“高管环保背景→提升环境合法性→减少企业‘漂绿’”的机制成立,验证了假设 H3。

3. 环境成本降低机制

环境成本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8 Panel A 的列(3)所示,

Green 对机制变量 *EA*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管的环保背景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方面的成本。为了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并规避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一些企业可能会采取“漂绿”策略。然而,高管的环保背景可能促使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采取更高效的措施,优化资源的使用和废物处理流程,从而有效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或支出。随着环境成本的降低,企业有能力更加真实地改进环境绩效,从而减少“漂绿”。此外,Panel B 的 Bootstrap 抽样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系数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 且显著。因此,“高管环保背景→降低环境成本→减少企业‘漂绿’”的机制成立,与假设 H4 的分析一致。

(二) 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高管环保背景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但这一影响可能因企业的异质性特征而存在差异。本文将从环境信息披露类型、行业性质和地理位置三个维度进一步探讨其异质性影响。

1. 考虑环境信息披露类型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分为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两种类型,二者在外部约束和企业自主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导致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由于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其信息披露的自由裁量权较小,因此进行“漂绿”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高管的环保理念和经验在此情境下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34]。相比之下,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面临较少的外部约束,可能通过选择性披露或虚假披露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信息来获取利益,更容易进行“漂绿”。因此,高管环保背景对于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漂绿”可能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本文将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赋值为 0,将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赋值为 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Voluntary*)与 *Green* 的交乘项加入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 9 的列(1)显示,*Green* × *Voluntary*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我们的分析。

2. 考虑行业性质

不同行业性质的企业的“漂绿”动机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普遍采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因此,重污染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环境监管压力和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可能通过“漂绿”策略缓解合法性压力并降低环保投入。相比之下,非重污染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相对较小,“漂绿”的程度较轻,高管环保背景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为了验证上述分析,若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则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污染企业(*Pollute*)与 *Green* 的交乘项加入模

表 8 机制检验

Panel A 回归法			
	(1)	(2)	(3)
	<i>EA</i>	<i>EL</i>	<i>EC</i>
<i>Green</i>	0.062 *** (2.695)	0.029 ** (2.349)	-0.480 ** (-1.989)
<i>Cons</i>	-0.788 (-1.395)	-0.091 (-0.312)	20.255 *** (4.376)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i>N</i>	10349	10349	10349
<i>Adj-R²</i>	0.667	0.330	0.266
Panel B Bootstrap 法			
间接效应系数	-0.019 *** (-3.284)	-0.012 *** (-5.012)	-0.005 *** (-2.861)
95% 置信区间	[-0.029, -0.003]	[-0.018, -0.008]	[-0.009, -0.002]

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9列(2)显示, $Green \times Pollute$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高管环保背景能够更有效地减少重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

3. 考虑地理位置

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沿海与内陆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其面临的外部监管环境和公众关注度,也间接塑造了高管环保背景发挥作用的条件。沿海城市通常具备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且公众和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企业实施“漂绿”战略的动机较小。相比之下,内陆城市的环保监管则较为宽松,为企业“漂绿”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通过因地制宜地利用其环保专业知识和内部监管能力,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位于内陆城市企业的“漂绿”行为。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本文将位于沿海城市的企业赋值为0,内陆城市的企业赋值为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位于内陆城市的企业(*Inland*)与*Green*的交乘项加入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9列(3)显示, $Green \times Inland$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在位于内陆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表9 异质性分析

	(1) GWS	(2) GWS	(3) GWS
<i>Green</i>	-0.110 *** (-3.000)	-0.146 *** (-3.960)	-0.114 *** (-3.231)
$Green \times Voluntary$	-0.180 *** (-3.022)		
<i>Voluntary</i>	0.048 (1.372)		
$Green \times Pollute$		-0.184 ** (-2.492)	
<i>Pollute</i>		-0.206 * (-1.846)	
$Green \times Inland$			-0.162 ** (-2.360)
<i>Inland</i>			0.299 (1.623)
<i>Cons</i>	4.033 *** (4.813)	4.002 *** (4.822)	4.251 *** (5.24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N	10349	10349	10349
Adj-R ²	0.411	0.416	0.390

六、结论性评述

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和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严峻挑战,我国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然而,现实中有很多企业通过“言浮于行”的“漂绿”策略来获取环境合法性和自身经济利益。因此,本文基于高阶理论,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高管环保背景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通过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提升企业环境合法性和减少企业环境成本抑制企业“漂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重污染企业和位于内陆城市的企业中,高管环保背景对于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以上结论与已有研究类似,即高管环保背景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并实现可持续发展^[13,21,23]。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启示:第一,本文验证了高管环保背景对于抑制企业“漂绿”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微观企业层面,建议将高管的环保责任提升至企业战略高度,构建“绿色领导力”。在高管选拔过程中,将环保背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并为现有高管提供系统化的环保培训,以提升其环境素养和专业知识。同时,调整高管激励机制,将长期环境绩效纳入高管薪酬考核体系,将高管个人利益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相绑定。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激励性政策,鼓励企业聘用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并提供税收优惠或其他激励措施。同时,加强高等教育中环保相关专业的建设,培养更多具备环保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第二,鉴于高管环保背景通过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提升企业环境合法性和减少企业环境成本减少企业“漂绿”。一方面,鼓励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通过内部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分享环保理念和最佳实践,将环保教育纳入员工培训体系,激发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积极申请并通过第三方环保认证,如绿色供应链认证、碳中和认证等,增加企业环保承诺的可信度。同时,邀请环保组织、消费者团体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进一步提高企业环保行为

的透明度和环境合法性。此外,鼓励和支持环保背景的高管研发或引进外部先进的绿色技术,如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等,以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第三,考虑到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为了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应当实施差异化政策。对于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并将评估结果与企业信用评级挂钩,形成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针对重污染企业,应加大环保监管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责任制度。对于内陆城市的企业,建议加强区域环境监管协作,避免出现监管盲区或“污染避难所”效应。

本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与研究前景可供探讨。首先,现有“漂绿”程度的评估依赖于有限的数据来源和第三方评价,难以全面反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对企业“漂绿”程度进行全面精确的分析。此外,本文仅聚焦于高管环保背景对于中国企业“漂绿”的影响,而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还较为匮乏。因此,未来亟须在这一领域开展更深入的探索,以丰富全球视角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Liu G, Qian H, Wu Q, et al. Research on the masking effect of vertical interlock on ESG greenwashing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4, 31(1): 196-209.
- [2] 李大元,贾晓琳,辛琳娜. 企业漂绿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12): 86-96.
- [3] 黄溶冰,陈伟,王凯慧. 外部融资需求、印象管理与企业漂绿[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3): 81-93.
- [4] Yu E P, Van Luu B, Chen C H. Greenwashing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disclosures [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0, 52(2): 101192.
- [5] 肖红军,张俊生,李伟阳. 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6): 109-121.
- [6] Zhang 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 How does the greenwashing respons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 80(2): 102058.
- [7] 孙自愿,汪玮,孙孟欣,等. 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的中介作用[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67-79.
- [8] 王建新,曹智铭.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58-67.
- [9]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 [10] 曹越,郭天泉.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0(2): 22-42.
- [11] 张增田,姚振玖,卢琦,等.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3(8): 68-82.
- [12] Du L, Ren S. CEO poverty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4, 33(3): 1853-1864.
- [13] Li X, Guo F, Wang J. A path towards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How does CEO green experience matter?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4, 33(2): 820-838.
- [14] 卢建词,姜广省. CEO绿色经历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J]. *经济管理*, 2022(2): 106-121.
- [15] 王辉,林伟芬,谢锐.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12): 173-194.
- [16] 曹洪军,陈泽文. 内外环境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效应——高管环保意识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6): 95-103.
- [17] Wang L, Li Y, Lu S,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CEO's green ecological experience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tax credit rating and tax burden [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 11(1): 1126692.
- [18] 凌鸿程,阳镇,许睿谦,等.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4(3): 189-210.
- [19] Cao C, Tong X, Chen Y, et al. How top managem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ffect corporate gr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rom China [J]. *Kybernetes*, 2022, 51(3): 1250-1279.
- [20] Ferrón-Vílchez V, Valero-Gil J, Suárez-Perales I. How does greenwashing influence managers' decision-mak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under stakeholder view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8(2): 860-880.

- [21]李毅,何冰洋,胡宗义,等. 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J]. 中国管理科学,2023(9):13-21.
- [22]Xu Q, Li X, Guo 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3, 30(4): 1816-1840.
- [23]Huang R, Wei J. Does CEOs' green experience affect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3, 79(3): 205-231.
- [24]Wei J, Liu T, Chavez D E, et al. Managing corporate-government relationships in a multi-cultural setting: How politic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CSR) as a response to legitimacy pressures affects firm reputation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0, 89(6): 1-12.
- [25]杨有德,徐光华,费锦华. 环境税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J]. 中国软科学,2024(5):132-141.
- [26]Tang J, Liu A, Gu J, et al. Can CEO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romot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4, 33(2): 985-1003.
- [27]Wei L, Liu Z, Cao P, et al. Environmental subsidies and green innovati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green background [J]. *Clean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2024(2): 1-14.
- [28]Zhang D. Subsidy expiration and greenwashing decision: Is there a role of bankruptcy risk? [J]. *Energy Economics*, 2023, 118(2): 106530.
- [29]毛其淋,石步超. 通向绿色发展之路:智能制造与企业绿色转型[J]. 世界经济,2024(9):152-182.
- [30]Li D, Huang M, Ren S, et al.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 green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carbon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CDP China 100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0(4): 1089-1104.
- [31]邹甘娜,袁一杰,许启凡. 环境成本、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23(2):169-180.
- [32]Hu X, Hua R, Liu Q, et al. The green fog: Environmental rating disagreement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 [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3, 78(2): 101952.
- [33]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4]李常青,辛立柱. 漂绿还是漂棕:非效率投资下的 ESG 漂洗倾向[J]. 经济管理,2024(5):168-189.

[责任编辑:高 婷]

Empty Words Without Action, Governance through Substance: Executives'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

NIU Feng, LUO Zhichao, QIU Baoyin

(School of Accounti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orporate "greenwashing"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achieving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xecutives'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focusing on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2.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ecutives with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can effectively curb corporate "greenwashing",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executives with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inhibit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y enhanc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mprov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 and reduc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o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executives'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that voluntarily disclos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heavily polluted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located in inland cit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of senior executives; Greenwash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 environmental cost